

# 朱雉剧曲考论

[作者] 富伟良；指导教师 陈根民

[单位] 杭州师范学院

[摘要] 朱素臣是明末清初苏州剧曲家群落中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对其著述及生平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对《翡翠园》作者及材料来源问题、《双熊梦》的取材问题进行考证，并就《双熊梦》的主题以及双线结构的传奇创作模式作了一定的论述。这对进一步研究朱素臣，乃至整个苏州作家群创作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朱素臣；翡翠园；双熊梦；双线结构

**Abstract:** ZhuSuche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Suzhou drama theorists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 the basis of Zhu's works and his life story, this paper centre on making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author and materials of Halcyon Garden and the materials of the Xiong Brothers' Story, and discussing the theme of the Xiong Brothers' Story and Two-Clued structure pattern of chuanqi creation. It's an important job for futher studying the creation of ZhuSuchen and Suzhou writers.

**Key word:** ZhuSuchen Halcyon Garden Xiong Brothers' Story Two-Clued structure

明末清初，苏州文坛上涌现了一批剧曲家，如李玉、朱佐朝、张大复、叶时章、丘园、毕魏等人，地位低微，交往密切，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声势浩大的苏州剧曲家群落。朱白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吴梅先生曾将他与李玉相提并论<sup>[i]</sup>，可见非同一般。

朱白雉，字素臣，号荃庵，吴县人。生平事迹湮没难考，仅知他出生寒素，未曾出仕，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所撰传奇十七种：《锦衣归》、《未央天》、《聚宝盆》、《双熊梦》、《文星现》、《龙凤钱》、《朝阳凤》、《秦楼月》、《万年觞》、《翡翠园》等十种今存；《振三纲》、《狻猊璧》、《忠孝间》、《四圣手》、《一著先》、《瑶池宴》、《全五福》等七种已佚。此外，他曾与毕魏、叶时章共同编定李玉撰著的《清忠谱》，和朱佐朝等四人合作《四奇观》，与丘园、叶时章、盛际时合撰《四大庆》，皆存。一般认为，他还与过孟起、盛国琦合著传奇《定蟾宫》<sup>[ii]</sup>，已佚。另有《杜少陵献三大礼赋》、《琴操问禅》、《杨升庵妓女游春》、《三笑姻缘》等四剧，前三者皆佚，后一种今存<sup>[iii]</sup>。曾协助李玉修订《北词广正谱》，与扬州李书云合作编纂《音韵须知》，还与李书云、汪蛟门、李书楼合作加工、题评、校订《西厢记演剧》。

关于朱白雉的生卒，不能详考，但也能知其大概。蒋星煜先生通过对《西厢记演剧》的考察，认为“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时，朱素臣仍旧还在人世。而且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书云、朱素臣合编的《音韵须知》由李书云刊行问世了。朱素臣也可能活得更久一些。”<sup>[1]</sup>后来康保成先生又有了重大发现，“最近，我在沈德潜《归愚诗钞》卷十中读到一首题为《凌氏如松堂文宴观剧》的诗，对于推测朱素臣的生卒年很有帮助。诗中说：‘忆昔康熙岁辛巳，横山先生执牛耳，堂开如松延众英，一时冠盖襄阳里，酒酣乐作翻新曲。’并有小字注云：‘时朱翁素臣制曲，有《杜少陵献三大礼赋》、《琴操问禅》、《杨升庵妓女游春》诸剧。’”<sup>[2]</sup>（P.34—35）康熙辛巳即1701年，横山先生即沈德潜的老师、著名文学家叶燮。可见，朱素臣于1701年尚在世。朱素臣曾与毕魏、叶时章共同编定李玉撰著的《清忠谱》，故其年龄应与毕魏、叶时章相差不大。一般认为，毕魏、叶时章当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左右。我们有理由将朱素臣的生卒定为1623?—1701年以后。

在了解了朱素臣创作、生平之后，本文将重点对其传奇《翡翠园》、《双熊梦》进行探讨，

并就《双熊梦》之主题以及双线结构模式加以论述，以期对朱素臣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 一、《翡翠园》研究

《翡翠园》传奇乃清初作品，其作者或归入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云朱素臣作。原刻本未见，现存最早的本子为有王国维名印并王氏题签“稿本翡翠园四本”。此书后归吴兴周越然，为言言斋所藏善本戏曲之一，今藏上海图书馆。首先我们有必要对《翡翠园》作者进行考订。

陆萼庭先生通过对《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录《翡翠园》所叙本事与今通行各本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对《盗令》主角问题的思考，认为“由麻翡翠出面盗令于情理最为契合：首先，翡翠自然最熟悉自家门路，且不致引人怀疑；其次，从全剧而言，正因翡翠有此奇功，后来德溥之子舒芬娶之理由充足。这样的安排可能更接近朱素臣（？）原本，现存各手抄本（包括所谓《稿本翡翠园》）恐均出后来改笔。”[3]陆先生的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存各手抄本多数属后来改笔。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朱素臣剧曲，每出之下都用两字概括剧情，如《双熊梦》、《秦楼月》等，而“稿本《翡翠园》”却没有这种情况。一些选本却有用两字概括剧情的情况，如姚燮的《今乐府选》就选录了《拜年》（第四出）、《谏父》（第五出）、《恩放》（第七出）等共八出。值得一提的是，《今乐府选》收录的《盗牌》（第十三出）一出自《醉花阴》曲起，“原本与《今乐府选》曲牌相同而词不同，说白亦多有差异，直至本剧终。疑为姚氏据原本改写，或者伶人演出时将原本改过，姚氏照改本钞录。六也本所收此剧，曲词说白与《今乐府选》同。”[4]（P.53）注释者指出了该出差异的存在，但在论述上纯属主观臆断，事实恰好相反，姚氏所录乃是原本，而王国维的“稿本《翡翠园》”却是改本无疑。改本方言词汇偏多，而且有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如最后一出中的圣旨云：“父德溥以军功，实授郟阳同知。母聂氏封孺人。”[4]（P.92）这里“聂氏”当作“卫氏”。

那么改本情节上是否有错漏颠倒呢？陆先生认为，赵翠儿盗牌得手后与打听消息的王馒头相遇前唱的[刮地风]“呀，趁着那酒熏人静插灯花，虚掩着门儿，窥几上光华。……”“写的是盗令时的情景，但又不像是回忆倒叙。”[3]其实，这里并无错讹，陆先生没有联系下文：“牌儿在竟进取无轻舍，俺战兢兢遍体犹麻，令牌儿今到咱。”[4]（P.51）这分明是回溯盗牌情景。赵翠儿成了盗牌的主角，而且前后未有抵牾之处。王馒头向卢大诰介绍舒家遭遇时说：“王府里令牌下来，直头要杀哉；方子一个湖州女子叫赵翠儿，一向原受舒秀才照顾个，那日正在麻府，得知子，[唱]他便巧计暗施，谋窃符乘醉后。”[4]（P.67）后来，赵翠儿在京遇到舒芬中状元游街，赵亲口告知舒芬家变：“始初是胡副使电冤开释，后来反发与麻贼，需捏供招，问成斩罪。又是我赵翠儿呵，[唱]令牌夜窃学赵姬，把冤囚赚救圜扉内。”[4]（P.81）可见，赵翠儿是盗令的主角在改本中是一贯的。

《翡翠园》原本《盗令》的主角是麻翡翠，《曲海总目提要》如此论述，即使是周越然在介绍改本故事情节时也说：“麻女翡翠怜其受诬，欲为解救，方苦无策。适有赵媪女翠儿至麻园，翡与翠素善，谈及舒冤，遂窃令牌，嘱翠密附王馒头往狱中救出德溥。”[5]（P.162）此论与《曲海总目提要》大同小异。而《曲海总目提要》在论及故事情节时未必忠实于原著，有时甚至黑白颠倒，漏洞百出。如在介绍《双熊梦》时，说：“盖其女曰侯三姑，女父曰油葫芦，屠户也。赌得钞十五贯，持归家。……姑避母族。”[6]（P.1957）以及结局“三姑于友兰，何氏于友蕙。”情节与原文迥异，错将苏戍娟当侯三姑，具体内容也与今本不符。可见，作者在

记述故事情节时或仅凭记忆，或据舞台演出，这才造成如此错讹的局面。即使是介绍《翡翠园》一剧，也多有问题，如原本或改本均无让德溥“半夜与群盗惧戮”的情形，赵媪也并未和翠儿一道至麻园翡翠处为舒氏父子求情等等。赵景深先生早就指出：“现存《曲海总目提要》是《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二书所凑合拢来的，”[7]（P.17）并论证《曲海总目提要》绝非黄文暘原本。故《曲海总目提要》中出现这类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知《曲海总目提要》最先将《翡翠园》列于朱素臣名下，这是有所依据的。民国《吴县志》中也认为《翡翠园》为朱素臣所作。《翡翠园》中的一些词句我们也能在朱素臣的其他作品中找到印证。如第二十六出众人挖苦麻长史时说：“饶伊掬尽湘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4]（P.91）《双熊梦》中也有类似字句：“饶咱掬尽湘江水，难洗今朝一脸羞。”[8]（P.155）朱素臣是原本《翡翠园》作者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附带地提一下《翡翠园》的取材问题。《曲海总目提要》认为：“演明正德间舒芬事，复用小说凑合，以新耳目。”[6]（P.917）并作了具体论述：

“其父以馆谷救人，见于稗史。翡、翠并取之说，所必无也。《庸行编》：江右舒翁，假馆湖广二年，偕诸乡里同舟归，途中登岸散步，闻一妇哭甚哀，问故，曰：‘吾夫贪官银，将鬻吾以偿，幼儿失哺必死，是以悲耳。’翁问所负几何？曰：十三两。翁曰：舟中皆塾师，每人一两，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应。翁遂捐两年束修尽与之。未至家三舍，粮竭。众争非之，亦有怜而食之者。翁不敢饱，及抵家，语妇云：吾忍饥二日，速炊饭。妇云：安所得米乎？翁曰：邻家借。妇云：借已频，专候汝归偿。偿其旧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妇喜云：如此，则家常饭可觅同饱也。遂往山中采苦菜同食。妇梦中忽闻窗外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产状元。遂促翁觉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是夜即有孕，明年产子芬，果状元。”[6]（P.919）

舒翁仗义捐金事颇似《双熊梦》中陶复朱助熊友兰事，作者在取材上确实是借鉴了《庸行编》。但总览全剧，我们发现《翡翠园》还借鉴了李渔小说集《无声戏》中《改八字苦尽甘来》（《连城璧》题作《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一篇。

王馒头在《翡翠园》中是一个重要人物，表现了他知恩图报的正直品质。第一剧总概剧情时有云：“岂穷吏施恩，累遭刑辱，改移八字，运际非常。”[4]（P.1）笔者认为，王馒头的遭遇与《改八字苦尽甘来》中主人公蒋成颇为相似，两人均是理刑厅皂隶，在改八字前，晦气缠身，从未有好运。后来改易八字，恰好与刑厅生辰八字相同，自此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有个别文字颇为相似，如刑厅见到蒋成的八字后对其妻子说：“我方才打了一个皂隶，他袖中掉下一张命纸，与我的八字一般一样。我做官，他做皂隶，也就有天渊之隔了，况且又是皂隶之中第一个落魄的。你道从那里差到那里？这等看来，命有甚么凭据？”[9]（P.63）而剧中是这样写的：“这也奇怪，却与本厅八字一一相同。咳！我便做了朝廷命官，他便做了随衙小役。咦！难道命是没有的？”[4]（P.65）笔者据此推测，朱素臣在创作《翡翠园》时对《改八字苦尽甘来》这篇小说有所吸收和借鉴。

## 二、《双熊梦》取材考辨

《双熊梦》，又名《十五贯》，情节离奇，关目曲折。它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分别陷入冤狱以及冤狱被澄清的故事。兄弟二人所陷入的“奇祸”均与十五贯钱有关。熊氏兄弟，家境贫寒，父母早亡，长兄友兰出外当艚，以供生计。弟弟友蕙在家闭门苦读，隔壁乃冯家米

店。冯家给童养媳侯三姑的十五贯钱和一双金环被老鼠衔走，金环被衔入友蕙书室，十五贯被衔入鼠洞。友蕙以为金环乃上天赐予，便到冯家米铺换粮，冯玉吾唤子锦郎向儿媳要环，锦郎误食友蕙放置了鼠药的炊饼中毒身亡。冯玉吾便认定友蕙与侯三姑有私情，暗中勾结做了盗窃杀人之事。二人被判死罪，并向友蕙追缴十五贯钱。其兄于苏州商船上闻知此事，义商陶复朱捐赠十五贯。友兰于回家途中，恰巧与清晨独行的青年女子苏戍娟相遇。原来头一天晚上，苏戍娟的继父屠户游葫芦从其姐姐那里借得十五贯钱，这钱乃是资助他开肉铺谋生的，但回家后却对苏戍娟开玩笑说钱是卖苏所得，故苏戍娟在清早悄悄逃走，投奔高桥姑妈。事有凑巧，苏戍娟走后，游葫芦被娄阿鼠杀害，十五贯钱被盗。当邻居发现与苏戍娟同行的熊友兰正好带有十五贯钱时，便认为友兰是嫌疑犯无疑，将他送官。两人被官府定为通奸杀人抢劫犯，亦判死罪。最后，况钟辨明冤屈。

《况太守集》卷三《遗事》第二十七条载：“(公)折狱明断，民有奇冤无不昭雪。有熊友兰、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阖郡有包龙图之颂，为作传奇，以演其事。惜一切断，不能尽传于世。”[10]《况太守集》系况钟九世孙况廷秀纂辑，该条所论是实有其事，还是据朱素臣剧敷衍渲染而来，已不可考。即使真有其事，况公确实昭雪过熊氏兄弟冤案，但冤案是否均由十五贯钱引起仍属疑问。朱素臣《双熊梦》故事的取材究竟来源于现实生活还是其他呢？到目前为止，关于其取材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取材于宋人话本《错斩崔宁》[iv]和《后汉书·李敬传》(吴·谢承，今佚)中李敬于鼠穴中得系珠珞珥事。此说首见于董康校订的《曲海总目提要》，认为“剧中本此两事，串合为一。”[6](P.1956)八十年代初王世德在其专著《〈十五贯〉研究》第三章有专门论述，之后，张燕瑾、弥松颐，庄一拂，周国雄等持此观点[v]。

二，取材于宋本《错斩崔宁》说，此说始见于署名“泃东一蟹”的《十五贯院本考》一文，载于1915年4月25日《小说月报》第6期第4号。[11](P.288)后来赵景深先生也采纳这一观点。北大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北师大郭预衡主编的文学史亦作如是观。罗宗强、陈洪主编的文学史也说：“该剧系据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和《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成，至今仍是昆曲舞台上的保留剧目。”[12](P.292)显然，这一论述中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即将《错斩崔宁》与《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看成了两个不同内容的小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编者对《李敬传》是只字未提的。

三，取材于《魏书》、《北史》所载司马悦为张堤平反冤狱的故事。此说创始人是吴德铎。[vi]

四，取材现实生活说。此说是蒋星煜先生在《况公祠和〈十五贯〉事件》[vii]一文的论述，认为《十五贯》所写况钟，实有其人，苏州城内西美巷至今还有况公祠的遗址，《明史》卷一六一(列传第四十九)亦有况钟治案清明的记载，可见《十五贯》与《错斩崔宁》未必有直接联系。徐扶明先生也认为该剧的材料来源之一是“取材于明代宣德年间苏州知府况钟平反冤狱的故事。”[13](P.200)

综观以上四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熊友兰一案取材于宋本《错斩崔宁》(《醒世恒言》题作《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仅个别字句有出入)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而熊友蕙一案的取材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熊友蕙一案是否与《李敬传》相关联呢？

《艺文类聚》卷八十四辑录《后汉书·李敬传》载：“汝南(今属河南)李敬，为赵相。奴于

鼠穴中得系珠，瑯珞相连。以问主簿。对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妇窃之，因去妇。’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惭，追去妇还。” [14] (P.1437) 按：范曄《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条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时为太尉，父益为赵国相。” [15] (P.2191) 今本《后汉书》仅此处提到了“赵国相”，其他未见。笔者认为《艺文类聚》中的“前相”当是李益无疑。故李膺与李敬当为同时，在桓帝朝（147—167）时期。

这则故事与熊友蕙一案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因老鼠衔物而导致冤案的发生。但在故事情节上，两者可谓有天壤之别。笔者认为，熊友蕙一案取材于《李敬传》的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一些学者在取材问题上不提《李敬传》是比较慎重的。

鲁迅先生说过：“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16] (P.430) 若要将《双熊梦》的取材考证清楚，我们首先必须将朱素臣的生平研究清楚。检赵景深、张增元编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关于朱素臣有如下两条：

《道光乍浦备志》三六：“字九先，居雅山之北，少习举子业，弃去为农。……崇禎乙亥（1635年）秋，李潜夫偕友人游雅山，闻其名，造庐而请谒焉。一见如故，遂与订交，称之畏友云。” [17] (P.164) 今按：雅山，今位于嘉兴平湖市乍浦镇，俗名瓦山，明末遗民李天植《乍浦九山补志》中有“自龙湫而西为观山，为汤山，为苦竹山，为雅山”的记载。从材料中可知，此朱素臣居住乍浦，且素臣是名非字，与苏州朱素臣当为二人，故兹不论。

《民国·吴县志》七五：“以字行，佚其名，尝助玉参订《北词广正谱》，又与李渔友善，著传奇十八种，今仅传《十五贯》、《翡翠园》二种。” [17] (P.165) 其中“与李渔友善”一条相当重要，这为我们破解《双熊梦》取材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李渔是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在中国所有的小说家中，唯有李渔有完整的别集传世。他留下的材料比曹雪芹、吴敬梓等人也多，涉及许多不同领域，是在中国文学中很难发现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有成就的作家。” [18] 正因为李渔所存资料翔实，这给研究提供了方便。查《李渔全集》第十九卷《李渔交游考》朱素臣条，单锦珩先生引录了《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及上引方志的资料，并明确指出：“渔曾为《秦楼月》作评。”值得补充的是，李渔不仅作评，而且还增写了《误觅》、《全节》两出戏，并谓：“聊取悦于世人之耳目，非于原文有所损益也。” [19] (P.90) 由此可见，朱李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当时，苏州派的剧作家往往取材小说来创作传奇，如李玉的《占花魁》、《牛头山》，朱良卿的《清风寨》、《夺秋魁》，朱素臣的《聚宝盆》、《朝阳凤》等等。那么《双熊梦》熊友蕙一线是否取材于李渔的小说呢？我们从李渔的小说入手，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值得庆幸的是，李渔的小说《无声戏》第二回《美男子避惑反生疑》（《连城璧》题作《清官不受扒灰谤，屈士难伸窃妇冤》）一篇与《双熊梦》熊友蕙与侯三姑一案情节基本相同 [viii]。为了便于说明，特列表比较如下：

篇目	时间	地点	人物对应	鼠窃物
《双熊梦》	明宣德、正统年间	江苏淮安	冯玉吾、锦郎、侯三姑	一双金环、十五贯
《无声戏》第二回	明正德年间	四川成都华阳县	赵玉吾、旭郎、何氏	一对扇坠

《双熊梦》中熊侯一案故事与《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的前半部分情节基本相同，且审案者都标榜清官，而且后来的“探鼠穴”情节两书均有。两下比照，我们还会发现某些语句存在着许多相似点，如侯三姑听到隔壁书生的读书声，就说：“那生一墙之隔，每常听他彻夜读书，将来必有发达之日，我每不可轻慢了。”[8](P.15)而在李渔的小说是这样写的：“书房隔壁，就是何氏的卧房。每夜书声，不到四更不住。……何氏道：‘看他读书这等用心，将来必定有些好处。’”[9](P.39)那么到底是谁借鉴了呢？毫无疑问，朱素臣借鉴了李渔的小说。理由如下：

首先，《无声戏》第二回目下有“此小说有传奇嗣出”几个小字。李渔习惯于为将出的书作预告，这也说明在《无声戏》出版之前，尚未有类似的传奇刊出，这一点相当重要。李渔主张创新的文学观，他说：“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白，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20](《凡例七则》)李渔的每一篇小说都冥心搜索，率出己意，让人耳目一新，确实是道他人所未道。故李渔的小说当比《双熊梦》先出。

其次，《无声戏》中许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传奇，其中包括李渔自己改编的三篇。《妒妇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被多人改编，最早改编的是孙雪崖的《绣帏灯》传奇。[21] (P.305)苏州作家群成员陈二白的《双冠诰》传奇也是取材于《无声戏》另一篇“嗣出”的《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连城璧》作《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李渔的《无声戏》有多篇被改编成了传奇已是不争的事实。

再次，从小说创作与传奇创作的关系来看，小说往往是传奇创作的题材来源，这在苏州派作家群中尤为明显。除了上面提到的传奇作品外，又如张大复的传奇《快活三》的主要情节是糅合《初刻拍案惊奇》中白话小说《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和《陶家翁大雨留客》的故事情节而成。

由此可见，朱素臣《双熊梦》传奇出自宋本小说《错斩崔宁》和李渔小说《无声戏》第二回可成定讞。这样的话也为《无声戏》一集的刊刻年代提供了线索。《无声戏》有前后两集，而《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篇应在前集。其刊刻、流传情况非常复杂，现在比较接受的是黄强的考订，认为《无声戏》二集(即前后集合刻本)“刊刻于顺治十一至十二年的可能性较大”[21] (P.376)。故《无声戏》一集的刊刻年代在顺治十二年前，具体年代不可考。而《双熊梦》“现存清顺治七年(1650)精抄本，《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藏，未署‘顺治七年二月’，凡2卷26出。”[22] (P.642)如此则《无声戏》一集的刊刻年代至少在顺治七年二月之前。李渔于顺治四年曾携妻妾至金坛(金坛位于江苏南部，苏州的西北)[21] (P.345)，并创作了第一部传奇《怜香伴》，从此走上了小说传奇创作的道路。《无声戏》在刊刻之后，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影响很大，朱素臣可能就是从中受到了启发。

至于李渔小说是否受到《后汉书·李敬传》的影响呢？恐怕未必。《李敬传》的故事与《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小说的结尾部分，但整个框架是不同的。李渔对史书相当熟悉，我们不能排除他受此启发的可能，而其《古今史略》却没有涉及李敬。从小说创作的连贯性来看，李渔小说据当时传闻的可能性更大。

经过以上的分析，《双熊梦》的取材问题应该说解决了，这将有助于朱素臣研究，乃至苏州作家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三，《双熊梦》主题及其双线结构

1956年4月，浙江昆苏剧团改编成昆剧《十五贯》在京演出，一时引起全国轰动。周恩来总理评价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23]之后，学术界形成了一个争相评论《十五贯》的高潮，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昆剧改编成功，原剧诸多糟粕。而广为称颂的成功之处就是删除了熊友蕙一线，其余波至今仍有影响。吴国钦先生认为《双熊梦》的严重缺陷“首先是结构繁复，情节过于离奇。”[24]（P.232）再如徐振贵教授也指出：熊友兰、友蕙“两案都是被诬通奸杀人，都是初审时因为巧合而误判，都是歌颂清官重勘明断，剧中两案的作用与只写一案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1956年江苏昆剧团（误，该团原名国风苏剧团，后改国风苏昆剧团，1956年4月，该团重组为国有，名浙江苏昆剧团）据此删去苏友蕙（误，当是熊友蕙）一案，编为《十五贯》，因而成为颇受欢迎的优秀剧目。因为这样一改，线索单一，眉目清晰。”[25]（P.475）要探讨改本昆剧与原本传奇孰优孰劣，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两者主题思想的差异。

周恩来总理认为改编本的主题很深刻，“《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23]这是符合事实的，吴新雷先生也认为：“新编本重新提炼主题，通过熊友兰和苏戌娟冤案被昭雪的全过程，歌颂了苏州知府况钟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亲民态度，鞭鞑了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武断、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26]吴先生不仅概括了新编本的主题，而且指出了改本与原本的主题差异。那么朱素臣原本主题如何呢？兰香梅认为：“朱素臣的《十五贯》通过苏州太守况钟平反冤狱的过程，抨击了草菅人命的官僚政治。”[27]更有甚者，如此评价曰：“作品通过熊氏兄弟的奇冤，揭露了官吏的贪婪和武断，同时也歌颂了清官况钟注重调查研究，敢于为民请命的正直行为，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12]（PP.291—292）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了当前的主题，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前面我们已经考证了《双熊梦》的取材来源：宋本《错斩崔宁》和李渔小说《无声戏·美男子避惑反生疑》。首先来看小说作者的观点。《错斩崔宁》在文中明确表明写作意图：“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殃危。劝君出话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28]（P.706）李渔小说也说：“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常把这樁奸情，做了殷鉴；二来叫人不可像赵玉吾，轻嘴薄舌，谈人闺闼之事，后来终有报应；三来又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一举而三善备焉，莫道野史无益于世。”[9]（P.54）可见，两篇小说均重在劝惩，而李渔小说偏于奇趣，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29]（P.115）笔者认为朱素臣的传奇主题同样是如此。如果作者要批判过于执的主观判案，批判周忱的官僚作风，那么结局就无法讲通：过于执诚心诚意向熊氏兄弟致歉，并努力作伐撮合熊氏兄弟姻缘等。蒋星煜先生曾有过这样的分析：“朱素臣原著这出戏写得比较细，改编本则又再加以丰富发展，所以感人至深。矛盾的一方是对人民生命十分负责的况钟。另一方是年迈位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周忱，并不是奸臣，也不是什么过于自信、刚愎自用的人。他严守朝廷法令，反对监斩的况钟过问案件，也并没有错。所以这一场矛盾冲突开展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30]（P.252）李玫先生对《双熊梦》就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过于执、周忱、况钟“这三个人都可说是清官。即使是两度断错案的过于执，也是个既不惧强凌弱，也不贪爱银钱，崇尚‘爱民如子，执法如山’信条的官员……审案时，态度也认真负责。……周忱在办事态度和宗旨上与况钟不同。周忱是个照章办事的官员……”[31]（P.59）所以，《双熊梦》的主题不可能是“揭露黑暗吏治的草菅人命”[32]（P.362）。作为民间剧曲家，其创作考虑更多的是故事情节奇趣和舞台演出效果。

如此，《十五贯》昆曲与原本传奇在主题上差异颇大。正因主题上的差异，笔者认为两者

在结构上的孰优孰劣就很难比较。改本一线到底，全剧仅八出，重点在况钟的实地考察，这对突出主题是成功的。而原本情节离奇，重在趣味，便于吸引观众，这无可非议，也是其成功之处。《双熊梦》的这种双线结构安排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双线结构是苏州作家群创作的普遍遵循的准则。康保成先生在论及苏州作家群创作的共同性时说：“一，基本采用双线结构；二，重视文场与武场、冷场与热场、庄与谐、悲与喜的调剂；三，成功地解决了热闹场面的舞台调度问题；四，重视悬念的设置与误会、巧合手法的运用。” [2] (P.110) 而且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苏州派的剧作，大体上都在三十出上下，几乎都采取双线结构。有不少戏，如《双冠诰》、《双熊梦》、《双螭壁》、《双和合》、《吉庆图》、《御袍恩》等等。” [2] (PP.110—111) 可见，双线结构的传奇创作是苏州作家群的共识。究其原因，多少有晚明吴江派创作的遗泽。徐朔方先生明确指出：“沈璟的剧作思想陈腐保守，而在艺术形式上却有志于革新。如《十笑》、《博笑》都是短剧的尝试，《红蕖》、《埋剑》、《双鱼》等剧其有程度不一的双重结构，立意以情节离奇、关目曲折取胜，对后来活跃于苏州一带的剧作家群影响不小。清初朱素臣的《双熊梦》（即后来的《十五贯》）就是同类型的作品。” [33] (P.293) 苏州作家群正是在吸收和借鉴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创作之后普遍采用“双线”的传奇结构模式。

其次，“用双线结构有利于设置悬念，使用误会法，在结尾来一个漂亮的大收煞。” [2] (P.111) 明末清初，尚奇逐怪之风在传奇创作中颇为盛行。清初高奕在《新传奇品·序》中说：“传奇至于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羁之才，写当场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宫调，不循声韵。但能便于搬演，发人歌泣，启人艳慕，近情动俗，描写活现，逞奇争巧，即可演行，不一而足。” [ix] 为了表现奇事怪情，采用双线结构，就可以通过悬念设置，给人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大大吸引了观众。

再次，双线结构是提供剧本演出的经济考虑。案头戏向舞台戏转变是戏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前，一些剧作家往往考虑文词的优美，而不大考虑演出的效果，故李渔提倡减头绪、贵显浅、重机趣等。随着剧曲创作的平民化，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人出于对生计的需要，开始为一些梨园提供剧本，这在苏州形成了一批以撰写传奇为生的作家群。朱素臣传奇《秦楼月》中有陶吃子说的一番话，可以看出苏州作家群和民间职业戏班的密切联系：“我老陶近日手中干瘪，亏了苏州有几位编新戏的相公，说道：‘老陶，你近日无聊，我各人有两本簇新好戏在此。闻得浙江一路，也学苏州，甚兴新戏，拿去卖些银子用用。归来每位送匹锦绸，送斤丝绵便罢，只算扶持你。’” [19] (P.74) 可见，当时一本新戏价值较为可观。如此的价值，一本新戏的长度就不能太短，考虑到演出效果，又不宜太长。双线结构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一本新戏保持在三十出左右。郭英德先生指出：“传奇剧本一般篇幅较长，在演出时，模拟神情，轻吟慢唱，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串完全本。如周明泰原藏清乾隆间内廷精写本弋阳腔《江流记》传奇和昆腔《进瓜记》传奇（今归上海图书馆），各有 18 出，剧本上明确标明演出时间为‘两个时辰零四刻’（大约 5 个小时）。以此类推，31 出至 50 出的传奇，便均须演出 9 至 15 个小时，往往要么通宵达旦，要么连演数天，才能串完全本。” [34] (P.99) 而“且人无论富贵贫贱，日间尽有当行之事，阅之未免妨工。” [20] (P.71) 故传奇演出，多为连演数天，三十出上下的剧本，则两天可以演完全本，而事实上一天也可完成。“与其长而不终，无宁短而有尾，故作传奇付优人，必先示以可长可短之法：取其情节可省之数折，另作暗号记之，遇清闲无事之人，则增入全演，否则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园亦乐于为此。” [20] (P.71) 如此，则三十上下的传奇恐怕一晚便可演完。所以，双线结构的创作既避免了头绪繁杂、不便舞台演出的缺憾，同时又为保证了传奇的创作长短，便于梨园采纳。

当然，双线结构的模式也是舞台效果的考虑。林鹤宜先生指出：“一部传奇的情节线包括生、旦相互感应、对称、配合的两条‘主情节线’；加上一条用来调剂排场文武闹静或夸逞生脚韬略的‘武戏情节线’；视故事的不同，又可搭配一条铺陈反面人物行动的‘对立情节线’；或是一条正面人物帮助生旦的‘辅助情节线’”[34]（P.151）可见，文场与武场、冷场与热场的设置，可以渲染舞台气氛，增强舞台效果，便于舞台演出，吸引观众。

总之，双线结构的创作模式在明清传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琵琶记》、《桃花扇》等多采用双线模式，便于故事情节的展开，对传奇结构的理论提供了实证。

蒋寅先生在评价明清诗文研究时说：“除了有数的几个大作家不断有人研究外，多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无人问津，或见一两篇新的题目，又属偶然涉及，比如获见一种珍贵的文献，随手写篇介绍评述，既缺乏背景知识，又远离学术流程，这样的零星成果再多也难以形成文学史的知识板块，并逐步构成文学史的完整景观。”[36]（P.202）这在朱素臣研究中同样适用。朱素臣作为清初苏州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一直以来由于生平史料阙如，文献无征，很少对其有整体关注。近年来，李玉研究有了新突破和新发展，尽管其生平仍然众说纷纭，而朱素臣的研究往往是稍稍提及，从未有深入的研究。即使在带及过程中，也往往是大同小异，有时甚至如出一辙。这里面有不少是以讹传讹、未作深入分析的信息，对此很有必要作出纠正。

朱素臣的剧曲非常适合舞台演出，颇受观众的欢迎。日本学者清水潔先生的论述就非常到位：“朱氏兄弟[x]创作的剧曲内容往往通俗易懂，描写手法巧妙绝伦，剧作雅俗共赏，而且宾白对话简明扼要，并夹杂滑稽可笑的生动形象，故伶人演他们的作品较多，许多作品也因此而得到保存。”[37]（PP.258—259）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收集全备他的现存剧曲。20世纪50年代，在郑振铎先生的主持下整理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该书收录了现存朱素臣的全部剧曲，但由于时隔久长，再加上印量不多，现已难得见到，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在认真仔细阅读了朱素臣的部分剧作后，我们对《翡翠园》作者及其取材作了一点研究，并在《双熊梦》的取材上有了新的发现，最后就《双熊梦》主题及双线结构的模式进行了探讨，这多少有所裨益。正是通过对朱素臣的粗浅研究，抛砖引玉，以期对苏州作家群能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注释：

[i]吴梅在其《中国戏曲概论》中说：“独李玄玉《一》、《人》、《永》、《占》，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秀》剧，雅丽工炼，尤非明季诸子可及，与朱素臣诸剧，可称瑜亮（茝庵诸作，以《秦楼月》、《翡翠园》为佳。）”见《吴梅全集·理论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P308。

[ii]姚燮《今乐考证》认为《定蟾宫》是“朱確、过孟起、盛国琦三人合作”，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P272。而支丰宜编的《曲目新编》作“朱石雀、过孟起、盛国琦三人合作”，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P154。恐是字形致误，故推断为“朱白雀”所作，并非毫无道理。又，吴新雷先生据梁廷桢《藤花亭曲话》卷一所记认为此剧系三人合作写成。见《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P137，因笔者未见原书，故不作论述。

[iii]江巨荣在《赵精深先生的藏书》一文中提及赵景深藏有朱素臣之《三笑姻缘》，见李平、胡忌编《赵景深印象》，学林出版社，2002年，P80。

[iv]1915年，缪荃孙（1844-1919）推出其不意中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收有《错斩崔宁》。1929年黎邵西最早对该书提出疑问，1935年，李家瑞发表《从俗字的演变上证明〈京本通俗小说〉不是影元写本》，马幼垣、马泰来兄弟在六十年代也认为《京本通俗小说》为伪书，在当前已成共识，以上见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P297-299。其中多数小说并非宋代小说，可参看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一期。徐朔方先生在《关于“京本通俗小说”》中也有论述，见《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409-411。尽管如此，现今尚无人能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否定《错斩崔宁》是宋代小说的结论。

[v]王世德的论述见其《〈十五贯〉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P24—25；张燕瑾，弥松颐观点见其《十五贯校注·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庄一拂所论见其编著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P1172；周国雄观点见李修生、赵义山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戏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269。

[vi]可参览《大地》，1981年第5期，此转引自张燕瑾，弥松颐《十五贯校注·前言》注释。

[vii]蒋先生《况公祠和〈十五贯〉事件》一文见其随笔集《以戏代药》，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viii] 近日有幸拜读郭英德先生的著作，他认为：“熊友蕙冤案，则借用谢承《后汉书》李敬于鼠穴中得系珠珥事。清李渔《无声戏》第四回《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叙明正德间成都华阳人蒋瑜与何氏之冤情，以鼠窃扇坠为媒介，亦同一构想。”见其《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P643。郭先生虽注意到了该剧与李渔小说的联系，但认为李渔小说创作的构想来自朱剧，恐不确。

[ix]此转引自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P237。

[x]清水潔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朱佐朝为兄，朱素臣为弟，佛教大学通信教育部，1989，P258；此说最先见于《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八著录《未央天》条注云：“闻明季时，有兄弟二人，皆擅才思，其一作《未央天》，其一作《瑞霓罗》。”据此推断两人为兄弟，但谁兄谁弟无从考知。

#### 参考文献

[1]蒋星煜.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J].文学遗产.1983,(4).

[2]康保成.苏州剧派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3]陆萼庭.读《曲海总目提要》札记[J].文学遗产.2003,(1).

[4]朱素臣撰，王永宽点校.翡翠园（明清传奇选刊）[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周越然.言言斋古籍丛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6]黄文暘原本，董康校订.曲海总目提要[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7]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M].洛阳:中州书画社.1983.
- [8]张燕瑾,弥松颐校.十五贯校注[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
- [9]李渔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10]点校.况太守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11]吕薇芬,张燕瑾主编.清代文学研究[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 [12]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册[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13]徐扶明.元明清戏曲探索[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14]欧阳询撰.艺文类聚[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C].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6]鲁迅全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7]赵景深,张增元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C].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8]张宏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韩南教授访问记[J].文学遗产.1998,(3).
- [19]李渔全集:第十八卷[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20]李渔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21]黄强.李渔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 [22]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23]周恩来.关于戏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J].文艺研究.1980,(1).
- [24]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80.
- [25]徐振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修订本)[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 [26]吴新雷.关于昆剧研究的百年回顾[J].东南大学学报.1999,(1).
- [27]兰香梅.论苏州派的新奇之点[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2).
- [28]冯梦龙编著,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 [29]鲁迅全集:第九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0]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M].洛阳：中州书画社.1982.
- [31]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32]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33]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34]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5]华玮、王瑗玲主编.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
- [36]《文学遗产》编辑部.世纪之交的对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7]清水潔.中国文学史[M].京都：佛教大学通信教育部.1989.